



法国哲学

第一辑

笛卡尔与笛卡尔主义

冯俊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法国哲学

第一辑

笛卡尔与笛卡尔主义

主编 冯俊

 商务印书馆
190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哲学. 第1辑 / 冯俊主编. — 北京：商务
印书馆，2016

ISBN 978 - 7 - 100 - 12602 - 1

I. ①法… II. ①冯… III. ①哲学—法国—文集
IV. ①B56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9811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法 国 哲 学

第一辑

冯俊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2602 - 1

2016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1/2

定价：70.00元

主办：中国法国哲学专业委员会

主 编：冯 俊

常务主编：方向红 刘 哲

法国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杜小真：北京大学哲学系

冯 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尚 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钱 捷：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

孙向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方向红：中山大学哲学系

关群德：商务印书馆哲社室

黄 作：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系

贾江鸿：南开大学哲学系

姜宇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李守利：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 哲：北京大学哲学系

孟彦文：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莫伟民：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余碧平：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王 恒：南京大学哲学系

吴 琼：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徐卫翔：同济大学哲学系

杨大春：浙江大学哲学系

游淙淇：台湾中山大学哲学研究所

于奇智：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系

张 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汪民安：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张 生：同济大学中文系

张尧均：同济大学哲学系

朱 刚：中山大学哲学系

本期集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经费资助

目 录

冯 俊 法国哲学的中国视角（代序）.....	（1）
------------------------	-----

回到笛卡尔

尚 杰 我 x 故我在 ——读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	（15）
杨大春 理解笛卡尔心灵哲学的三个维度	（31）
余碧平 论笛卡尔的存在概念	（46）
李 琨 以“罪”替“错” ——辨析《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对错误来源的回答	（63）
张小星 清楚明晰与可错主义	（88）
刘长安 笛卡尔“上帝观念”的三种含义及其统一性	（115）

笛卡尔与法国传统

钱 捷 列维纳斯，回到笛卡尔！	（133）
施 璇 笛卡尔学说在十七世纪下半叶法国的遭遇	（140）
马迎辉 梅洛-庞蒂论“沉默的我思”	（161）
王 辉 从福柯的“笛卡尔时刻”到笛卡尔的“作为伦理的方法” ——以笛卡尔的《谈谈方法》为例试析两种“方法”	（178）

汤明洁 相共还是表征?
——走出“我思”的古典迷局 (197)

笛卡尔主义与当代思潮

倪梁康 胡塞尔与法国现象学运动的直接思想关联
——法国哲学家柯瓦雷、海林、勒维纳斯的胡塞尔现象学
背景 (213)

胡成恩 “我思”之“我”何以可能?
——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自我”概念 (229)

庞培培 论梅洛-庞蒂对萨特否定哲学的批评 (245)

李守利 现代哲学的奠基：先验现象学视域中的笛卡尔 (261)

法国哲学的中国视角（代序）*

冯俊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在演讲中说道：“我青年时代就对法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法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深深吸引着我。读法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史的书籍，让我丰富了对人类社会政治演进规律的思考。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等人的著作，让我加深了对思想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认识。”在这里他谈到了法国哲学和中国人对法国哲学的兴趣。

17世纪法国最早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和随后来华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士给中国带来法国哲学，同时又把当时中国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宋明理学带回法国，自此之后就产生了中法哲学的冲突和相互理解问题，当时在中国发生了著名的关于中国文化的“礼俗之争”，在法国，著名的宗教哲学家马勒伯朗士也写出了《一位中国哲学家和一位基督教哲学家的对话》。四百多

* 本文是作者于2014年5月15日在复旦大学第一届中法论坛暨法国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演讲，主要内容发表在《解放日报》2014年6月12日第7版，《新华文摘》2014年第17期转载，在这里按演讲原文发表，稍作改动，代为序。

年来，中法哲学的交流一直在延续和发展。法国哲学到底关注哪些问题？中国人又对于法国哲学的哪些问题感兴趣呢？

理性与非理性的交叠对峙

在法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一直是纠缠在一起的两条主线，时而是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时而是非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一直贯穿始终。

文艺复兴时期的蒙台涅（Montaigne，又译作蒙田）是法国哲学的先驱，他对于17世纪的笛卡尔和帕斯卡尔产生了双重的影响。

首先，蒙台涅的怀疑主义影响了笛卡尔“怀疑一切”的方法论和自由的批判精神。蒙台涅是法国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因《散文集》（*Les Essais*）而著称于世。同时因《为雷蒙·德·塞邦辩护》（*Apologie de Raymond de Sebonde*）这一长篇散文中深邃的思想，而被视为著名的哲学家。他的座右铭：“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运用古罗马时期的怀疑论皮罗主义（*pyrrhonisme*）的论据来说明，一切事物都是值得怀疑的，所谓真正的知识或者是通过经验获得，或者通过推理获得。蒙台涅被人们看作是具有批判精神的自由思想家。笛卡尔对于从经验获得的知识以及以往科学知识的怀疑，对现成的知识的批判，敢于怀疑一切的精神，这些都是受到蒙台涅的影响。普遍怀疑的方法是笛卡尔的第一个方法。笛卡尔认为，应该“认真地、自由地来对我的全部旧见解进行一次总的清算”，“如果我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的历来信以为真的一些见解统统消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①“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这是一条唯一不能怀疑的第一原理。这是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之后找到的一个立足点。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不同于怀疑论者以怀疑为目的而走向虚无主义的为怀疑而怀疑的

^①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页。

怀疑，而是方法论上的怀疑，怀疑是为了发现真理，得到确实的知识。笛卡尔并没有对于人类的认识能力得出消极悲观的结论，相反他对于人类的认识能力充满着自信，认为人类的直观能力是可以获得关于自然和人自身的知识的。

蒙台涅也影响了帕斯卡尔的非理性主义和人学。文艺复兴以来的一些人文主义者颂扬了人类的伟大、尊严和理性，而蒙台涅揭示了人类的渺小、可悲和信仰，这就使得帕斯卡尔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综合，既让我们看到人的伟大和尊严，又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可悲；既看到人类理性能力的作用，同时又看到理性的无能 and 信仰对它的超越。帕斯卡尔把心灵在几何学中的推理活动或推理方式，如抽象、分析和演绎等逻辑思维和推理的活动叫作“几何学精神”（l'esprit de géométrie）。帕斯卡尔是充分地肯定了几何学的作用，并且在他的科学研究中也广泛地运用了几何学的证明和推演的方法。然而，帕斯卡尔认为几何学的方法是有限的，过分抬高理性或理智的作用是一种理性的独断。帕斯卡尔指出了它们的缺陷：首先，几何学方法是要建立一个公理体系，对它所用的全部概念、名词进行定义，并从已经确立的真理中演绎出全部其他命题。但是，原始概念和第一原则却是不能通过几何学方法来证明的。第二，对于人的生存状况、前途和命运、痛苦和幸福、伟大和渺小，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人的幸福与可悲、人的目的和出路的问题是不能进行推理和演绎的。第三，理性和几何学方法在形而上学和宗教领域也是无效的。理性对于认识或证明上帝完全是无能为力。除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几何学精神而外，帕斯卡尔更为突出地强调以人心或内心为基础的“l'esprit de finesse”，即敏感性精神、微妙的精神、精确性的精神。它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人们的一种良好洞见力。敏感性精神，就其认识论基础而言它就是人心或内心。对内心（le coeur），帕斯卡尔有感情、意志、本能多种规定，人心、内心对于基督教的辩护、对于宗教形而上学的建立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了内心的作用才有信仰。

在17世纪，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得以确立，但是理性主义占上风。

18世纪是理性主义的时代。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将上一个世纪的哲学

家所确立的理性主义变成一种现实的政治原则。理性主义成为他们反对封建意识形态、勾画新社会蓝图的标尺。理性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以往的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用理性代替神的启示，用人的自然光明去代替盲从和迷信。启蒙哲学家举起理性旗帜，主要目的是反对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宗教神学，剥去它为法国封建制度所包裹的神圣外衣。启蒙思想家所勾画的“理想”的社会——即自由、平等、正义的社会——也是一个“理性”的社会，作为他们的社会政治哲学基石的自然法理论体现的就是理性主义原则。

19世纪是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双峰对峙的时代。19世纪的法国哲学中雷诺维耶（Renouvier）的新批判主义和孔德的实证主义继承了启蒙哲学的传统，而比朗（Maine de Biran, 1766—1824）、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和布隆代尔（Maurice Blondel, 1861—1949）——被称作改变法国哲学发展方向、奠定法国现代哲学基础的三B哲人（三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都是B）——则继承了非理性主义的传统。

20世纪的法国哲学可以说是非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除巴什拉等人的科学哲学和结构主义哲学可以说体现了理性主义的原则之外，萨特的存在主义是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也是非理性主义。德里达、福柯、德鲁兹等人追随尼采和海德格尔，对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笛卡尔直至康德、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传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总体上看来，20世纪的法国哲学是非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

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是论证上帝存在、灵魂不朽和意志自由。尽管笛卡尔是欧洲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理性主义哲学的奠基者，但是他的新哲学仍然还是借助传统形而上学的外壳，他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仍然沿袭第一哲学和物理学的区分，仍然把第一哲学作为核心，尽管他的哲学的实质是给我们展示一种新的认识论，但是他还是以“传统形而上学”的“旧瓶”来装“认识论”的“新酒”；马勒伯朗士的宗教哲学更是旧形而上学和神学的结合；帕斯卡尔用非理性主义来反对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只是为形而上学替换了基础，而没有跳出传统形而上

学的樊篱。

18 世纪的启蒙哲学就是从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反对抽象的绝对开始的，它要把为神学作论证的工具变成批判神学的武器，启蒙哲学不仅反对宗教神学，而且还反对作为宗教神学的理论根据的一切形而上学。孔狄亚克、卢梭、狄德罗等人对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的形而上学体系乃至一切形而上学体系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19 世纪，从梅纳·德·比朗至柏格森，法国哲学家建立起一长串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他们分别以心理学、道德和宗教来作为自己形而上学体系的基础。而 19 世纪的孔德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他不仅要反对“希腊学派关于本体论的议论”、希腊本体论在中世纪哲学中的变体、近代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同时还要直接反对他同时代以梅纳·德·比朗等人为代表的观念论者的形而上学。

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与形而上学有着非常特殊和复杂的关系。17 世纪是形而上学时代，既有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又有非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18 世纪的唯物主义和 19 世纪的实证主义批判和拒斥一切形而上学；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法国三 B 传统则是试图重建非理性主义形而上学；20 世纪的存在主义也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而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主义要消解或解构一切形而上学。可见，理性主义既可以建立形而上学，也可以拒斥形而上学；非理性主义既可以建立或重建形而上学，也可以消解和解构形而上学。

“进步”与“解放”的价值重估

启蒙哲学崇尚理性、研究自然、鼓吹进步，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动力，哲学和整个时代的革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启蒙哲学家以 17 世纪哲学家提出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自然法和自然状态等理论为出发点，对人和社会作了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建立了资产阶级社会国家学说的完备的理论体系，揭示了人性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孟德斯鸠、卢梭是社会政治哲学的重要奠基人，他们反对封建专制、提倡自由平等，不仅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武器，而且成为后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国纲领。

社会历史的重大变革促使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进行深层的哲学思考。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法国的文化界曾展开过旷日持久的“古人与今人”孰优孰劣、孰高孰低的大讨论，这成为历史哲学在法国兴起的直接契机。波舒哀唤起了近代哲学对于历史哲学的注意；孟德斯鸠在研究罗马帝国的兴衰和法的精神时，已经开始自觉地总结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伏尔泰是历史哲学的奠基人，他在卷帙浩繁的历史学著作中阐发了他的历史哲学思想；杜尔哥和孔多塞继伏尔泰之后，进一步鼓吹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18世纪的法国历史哲学中贯穿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认为历史是一个进步发展的过程，把进步看作历史的基本规律。历史发展不是偶然事件的堆砌，而是有规律可循的。

我把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这个时期的法国哲学称之为“后启蒙时代”，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哲学问题是启蒙时代哲学理论的继续延伸，它主要是围绕着是继承发扬还是反对、扼杀启蒙时代的哲学精神而展开的。后启蒙时代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于启蒙时代社会历史观是认同还是反对。这一时期出现了观念学派（les idéologues）、实证主义、精神论（spiritualisme）运动、生命哲学和人格主义等许多新哲学流派，产生了梅纳·德·比朗、维克多·库赞（Victor Cousin, 1792—1867）、孔德（Comte）、雷诺维耶（Charles Renouvier, 1815—1903）、拉韦松（Félix Lacher Ravaisson, 1813—1900）、布隆代尔、柏格森等一大批著名的哲学家。正是在这个时代，法国哲学才显示出它的丰富色彩和民族特质，它是法国哲学从近代走向现代的桥梁。

从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历史观来看，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它不仅使法兰西民族获得了解放、再生和自由，同时也给世界上其他民族带来解放、生机和自由，它是自宗教改革以来资本主义精神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胜利。圣-西门

（Claude 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Saint-Simon, 1760—1825）、傅立叶（Charles Fourier, 1772—1837）和普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 1809—1865）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和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矛盾和罪恶，提出了要建立更加幸福、合理、和谐的社会制度。他们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他们的历史观是对启蒙哲学家的继承和发展。实证哲学的创始人孔德在社会历史观上继承了杜尔哥、孔多塞、圣-西门和进化论的思想，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上升、前进的过程，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社会历史像生物界一样是一个连续进化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处在社会发展的总体链条之中。

然而也有人把法国大革命的胜利看成是一场灾难，它破坏了社会的基础和稳定，扼杀了法国的民族传统，抛掉了道德和社会统一的宗教基础。从哲学上来否定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哲学派别是传统主义。传统主义的特点是坚持法国的政治传统和宗教传统，反对革命精神，攻击启蒙哲学，反对理性主义。其思想先驱是圣-马丁（Louis Claude de Saint-Martin, 1745—1803），传统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 1753—1821）和德·波纳尔（Louis de Bonald, 1754—1840），他们的哲学是为拿破仑恢复帝制作理论说明。折中主义（*éclectisme*）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官方哲学，它是以库赞等人为主要代表的。这种折中主义在哲学理论上，将感觉主义、常识哲学、观念论和神秘主义调和在一起，同时在政治态度上，提出可以建立一种在自身中综合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中各种有价值因素的社会制度。折中主义企图找到一条中间路线，要求君主立宪，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调和精神。

崇尚理性、自由、平等、进步的启蒙精神就是现代性的突出体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哲学讨论的重要主题。

卢梭是现代性最早的批判者。他通过把自然和文明对立起来，对资本主义的文化、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教育方式进行了全面

的批判。卢梭意识到，科学艺术的进步和发展是与人民的幸福相矛盾的，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与人的道德水准是成反比的。现实文化被奢侈、金钱和低级趣味的时尚所左右，完全变成一种金钱文化和低格调的俗文化。卢梭认为，从自然状态进入到社会状态，就使人类从平等进入到不平等，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不平等就加深一步。在卢梭对于人类不平等发展阶段的分析中，渗透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评价卢梭这一学说时写道：“这样，卢梭就看到了不平等的产生是进步。可是这种进步包含着对抗，它同时又是退步。……文明向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进一步，……压迫者被压迫，这就是否定的否定。”^①矛盾的对抗向对立面转化，事物发展呈现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卢梭的这一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黑格尔思想的形成。卢梭并不是认为在社会状态中人就注定是不自由和不平等的。恰恰相反，卢梭把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状态看作是不合理的社会状态。卢梭要实现否定之否定，使人在一种全新社会状态中达到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的自由和平等。

理性和进步，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思考的两个问题。福柯等人反对理性的总体性，反对理性的暴力、理性的极权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针对启蒙哲学的。“进步”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解放”概念也是后现代主义要“解构”的。对于“进步”，后现代主义有一系列疑问：人类的历史是否真是不断进步的？“进步”难道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再次，进步真是一件好事情吗？进步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不就是人类的大量牺牲、人的自由的不断丧失、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吗？对于“解放”，后现代主义也有不同的看法。首先，“解放”是一个宏大叙事和元话语，是为后现代主义所摈弃的；其次，人的解放的过程也是人逐渐取得主体地位、成为独立主体的过程，而主体的形成、建构过程同时也是人逐渐被规训化的过程，因而最终是限制人、制约人，使人丧失自由。这样，后现代主义不仅解构了启蒙哲学的理性主义原则，同时还把启蒙哲学的“进步”和“解放”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页。

概念也解构了。最后，后现代主义则认为，科学使人走入了误区，科学制造出灭绝人类的武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过度滥用，导致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使地球越来越不适于人类的生存。更为重要的是，科学不能解决人的精神问题，人的道德、人的价值、人的理想信念、人的终极关怀等都不是科学和理性所能解决的。

人文与社会的多重呈现

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相比，法国近代哲学似乎有以下几个风格特征：

1. 法国哲学一直贯穿着一种怀疑精神和崇尚理性的精神。怀疑精神和崇尚理性的精神是同一种精神，可以说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如果说怀疑是否定的、批判的一面，崇尚理性就是肯定的、建树的一面。怀疑的目的就是要崇尚理性，或者说怀疑只是理性的一种手段。中世纪的唯名论者阿伯拉尔、文艺复兴时期的蒙台涅、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18世纪的贝尔、伏尔泰等人都极重视怀疑，这种敢向传统、权威挑战的怀疑精神，在法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甚至20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也体现了怀疑精神，它怀疑被人们顶礼膜拜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怀疑历史进步论和启蒙精神，怀疑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成果，颠覆人道主义，等等。

2. 人和社会是法国哲学聚焦的对象。自然和人是哲学的永恒主题，而和其他国别的哲学相比较，法国哲学则更注重对人和社会的研究。爱尔维修注重人的灵性、强调人的精神性，把人作为一个文化的对象，看作是教育的产物。存在主义哲学就是一种人学。孔德直接就是近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从杜尔凯姆到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他们都十分注重对于现代社会的研究，这些都应该看作是法国哲学对人类认识社会的贡献。后现代主义对于后工业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对于正在大力推进现代化的我们不亚于是一剂清醒剂。

3. 开放性。法国哲学特别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哲学精华，最具开放性。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极大地吸收了英国唯物主义哲学、特别是洛克的经验

论，狄德罗还极大地吸收了莱布尼茨（Wilhelm Gottfried Leibniz，1646—1716）哲学中的辩证法因素。19世纪，雷诺维耶的新批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康德哲学的继承，而阿默兰（Octave Hamelin，1856—1907）的唯心主义则和黑格尔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3H（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3M（马克思、马克斯·韦伯、马尔库塞）和尼采都是德国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是丹麦哲学家，弗洛伊德是奥地利的心理学家，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元素影响着20世纪法国哲学的面貌。

4. 社会参与性。法国哲学不是书斋里的哲学，而是与现实斗争紧密相连的哲学，哲学家不喜欢身居斗室去进行玄学的思辨，而更加关注社会的变革和政治的斗争，他们有一种使命感和时代感，是现实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5. 哲学和文学有着不解之缘。法国哲学家最富激情，他们不是只沉湎于理智王国而缺乏情感的冷酷哲学家，他们是哲学家同时又是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都是名垂史册的文学家、戏剧家、文艺批评家，擅长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两百年后的柏格森、萨特和加缪这三位伟大的哲学家则捧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法国哲学的中国传播

法国哲学的这些特点使得中国人对法国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因为中国哲学把哲学理解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认为哲学更多关注的是政治社会、道德伦常问题，而且在中国古代文史哲是不分家的，这些特点和法国哲学有共同性，因此，中国人很容易接受法国哲学。

一种外来的哲学是否被接受、被传扬并不完全是由这种哲学理论自身所决定的，关键是看这种哲学是否能够满足接受国所处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需要。所以，法国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由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中中国人的文化需要决定的。

从近一百年来法国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来看，中国人对于法国哲学的主要兴趣大致集中在以下几点：